



基础教育的传统与创新丛书

主编 / 黄书光

变革与创新

BIANGGE YU CHUANGXIN

中国中小学德育演进的

文化审视

黄书光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资助项目
国家“985工程”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创新基地建设项目

基础教育的传统与创新丛书

主编 / 黄书光

变革与创新

中国中小学德育演进的

文化审视

黄书光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BIANGGT YU CHUANGX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与创新:中国中小学德育演进的文化审视/黄书光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基础教育的传统与创新丛书)
ISBN 978-7-5328-5834-7

I. 变... II. 黄... III. 德育—教学研究—中小学—中国 IV. G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648 号

基础教育的传统与创新丛书

变革与创新

中国中小学德育演进的文化审视

黄书光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14.25 印张

字 数: 22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5834-7

定 价: 2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基础教育已走过了百年历史。百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始终在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与交融中向前迈进。这其中既有沉痛的教训,又不乏可贵的经验。当代基础教育的理论创新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只能是植根实践基础上的历史传统之现代转化与学术再创造。为了多角度、相对系统深入地剖析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历程、基本特点、主要症结和发展路向,本丛书将研究思路定位于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史论结合的动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既需要查阅大量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包括以往正统史学所不屑一顾的下层民间资料,尽可能地回到真实的“历史场域”;又要求深入了解当代基础教育改革实际,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的火热生活,使理论与实践互动并行;全方位地反映 20 世纪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艰难行程,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并努力就相关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和对策建议。

为了使研究对象相对集中,我们精心选择了基础教育领域中最具活力的教师发展、德育变迁、课程改革、教学话语、私人办学等核心要素进行专题性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旨在推动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转型性变革和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实质性进展。具体而言,本丛书(首批书目)由如下 5 本著作组成:

1. 《回溯与展望: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的世纪转型》(卜玉华著)
2. 《变革与创新:中国中小学德育演进的文化审视》(黄书光著)
3. 《冲突与融合: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李彦荣著)
4. 《移植与重建:中国中小学教学的话语转换》(黄忠敬等著)
5. 《传统与再生:中国私立和民办中小学的本土成长》(马镛著)

如上 5 本著作的撰著者都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现在都

是教授或副教授,分别来自教育史和教育学原理专业,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恰好满足了本丛书研究“史论结合”的初衷。不过,作为学术专著,我们并不希望强求一律,而是在基本认同“传统”与“创新”辩证统一关系的前提下,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借鉴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综合采纳历史叙事、逻辑分析、理论比较、个案剖析、实践体验等研究方式,充分挖掘各自的学术特长,自由地释放各自的学术潜能,对自己所确定和心仪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学术批判、反思、前瞻与重建,力求提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学术见解。

面对共同的学术理想,我们志趣相投,意气风发,研究态度也非常认真投入,相互之间常常为一些学术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整个研究过程呈现出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机与灵动的良好状态。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选择的5个专题及其研究路径毕竟为前人所较少涉足,具有相当的研究难度,也具有一定学术挑战性和开拓性。我们选择的视角、方法与研究框架是否合理?所把握的核心问题和本质内涵是否准确?所做出的考证和分析是否得当?所推断的预测与展望是否合乎实际?凡此种种,我们虽然已尽了心中的良知与天平,但最终做出审判的还是读者诸君的敏锐眼光。热切地期待着专家、学者们的真诚批评与指正。

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在本丛书出版之际,特向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黄书光

2007年9月25日

目 录

总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中国中小学德育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制度变迁	(5)
第一节 清末民初:新旧德育观的博弈与相持	(5)
一、民族危难中旧学批判与西方近代德育观念的本土化阐释	(5)
二、旧学批判的深入与西方近代德育观念本土化阐释的进一步探索	(9)
三、“中体西用”与晚清学堂德育的制度化建构	(12)
四、民国初年的德育革新与复古逆流	(16)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德育的现代变革	(18)
一、中国传统德育观念的激烈批判	(19)
二、中国现代学校德育体系的初步探索	(22)
三、学生自治制的引进、实施及其困惑	(25)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思想控制与训育制度	(29)
一、思想控制与“党化教育”对现代德育精神的背离	(29)
二、“训育制度”的严密化及其专制色彩	(31)
第四节 共和国学校德育的历史进步与曲折发展	(34)
一、社会转型与共和国学校德育改革的价值导向	(35)
二、德育政治化的累积与攀升	(38)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德育的深度变革	(39)

第二章 从臣民到公民:德育目标的现代建构	(42)
第一节 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与臣民人格的抨击	(42)
一、国士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42)
二、臣民人格的批判与国民精神的呼唤	(44)
第二节 “个性”的觉醒:中小学德育目标的现代探索	(46)
一、“个性”的觉醒及其意义	(46)
二、“健全人格”的提出与中小学德育目标的现代转型	(48)
第三节 德育目标的政治化导向及其分歧	(51)
一、被篡改的“三民主义”与德育目标的专制主义导向	(52)
二、人民本位与德育目标的革命理想	(55)
第四节 共和国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变革与反思	(57)
一、共和国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建构与演化	(57)
二、新时期中小学德育目标的改革与调适	(62)
三、回归与超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小学德育目标沉思	(67)
第三章 价值观念变迁与德育课程教学的深层透视(上)	(70)
第一节 “中体西用”的价值选择与清末学堂的德育课程教学	(70)
一、“中体西用”的价值选择	(70)
二、清末学堂德育课程设置的文化本位精神	(72)
三、修身教科书编写的本土意识与时代观念	(76)
四、读经讲经、修身教学及其问题	(79)
第二节 价值观念的新旧交替与中小学德育课程教学的转型性探索	(81)
一、社会转型与价值重建	(81)
二、德育课程设置的曲折变化	(82)
三、修身教科书编写的改进	(86)
四、修身教学的求索与思考	(89)
五、共和理想的身体投射:从个体修身到国家公民	(92)
第三节 “三民主义”文化统制与德育课程教学的模具化	(94)
一、“党化教育”的提出与“三民主义”文化统制	(95)

二、德育课程标准的历史建构·····	(97)
三、德育课程实施的设计和监控·····	(105)
四、“新生活运动”的旧道德本质及其人格想象·····	(110)
第四章 价值观念变迁与德育课程教学的深层透视(下) ·····	(114)
第一节 来自革命根据地的创造精神:德育课程教学新探索·····	(114)
一、突出为革命战争及生产建设服务的课程设置原则·····	(114)
二、编写简明、易懂、鲜活的革命教材·····	(125)
三、实施联系实际、机动多样的教学策略·····	(131)
第二节 后革命时代的德育课程教学变迁·····	(136)
一、“五爱”教育的确立及其在课程教学中的渗透·····	(137)
二、苏联德育思想的导入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高扬·····	(140)
三、阶级教育的突显与强化·····	(144)
四、政治化情结与德育课程教学名称的频繁变动·····	(148)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与德育课程教学的严重扭曲·····	(154)
一、“斗、批、改”的极左路线与学校的“教育革命”导向·····	(154)
二、政治挂帅的简约化课程·····	(155)
三、充满“革命”话语的教材读物·····	(160)
四、小将和工农兵上讲台·····	(164)
第四节 多元文化冲击与德育课程教学的开拓创新·····	(166)
一、拨乱反正与共和国优良德育传统的弘扬·····	(166)
二、德育课程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建设(上)·····	(168)
三、德育课程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建设(下)·····	(171)
四、德育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173)
第五章 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环境与当代中国德育创新 ·····	(182)
第一节 全球化与传统人格的现代转型·····	(182)
一、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化际遇·····	(182)
二、全球化对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教育的冲击·····	(184)
三、从“现代中国人”到“世界中国人”·····	(186)
第二节 多元文化、网络世界与东西方道德教育整合·····	(188)

一、中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构成及其当代表现	(189)
二、网络世界的价值挑战与对策	(191)
三、全球伦理建构与东西方道德教育整合	(195)
第三节 生活世界与当代学校德育探索	(201)
一、脱离儿童生活实际的德育政治化与功利化	(201)
二、回归“生活世界”的当代德育探索	(204)
主要参考文献	(210)
后 记	(222)

德育的理论与实践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已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中小学德育的历史研究则相对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已开始注目德育史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张志建著的《中学思想政治课发展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高谦民主编的《中国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孙少平编著的《新中国德育 50 年》(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年)、郑航著的《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等,但这些研究或偏重于中小学德育的某些侧面,或着眼于德育发展的某个时期,至今仍缺少一部较为系统、能够贯通整个 20 世纪中国中小学德育变革的研究著作。清末以来,中国中小学德育变革确实十分复杂,特别是这一变革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仍在戏剧性进行中,具有很强的时代现实感。职是之故,本书尝试以核心问题的形式对中国中小学德育变革演进进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和文化审视,并力图对全球化际遇中的当代中国德育创新提出一得之见。这一问题研究取向的目的,即是强调德育历史与现实的内在关联,旨在“使过去、现在、未来的教育生命之流连绵接续,推陈出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火热的教育改革与实践”。^①

以问题为主线的教育史研究,关键在于对问题的把握是否准确,对问题的理解是否贴近时代精神,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经过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阅读消化和现实经验的感受体悟,本书逐渐将探视镜头聚焦在:中国中小学德育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制度变迁、德育目标从“臣民”到“公民”的现代建构、价值观念变迁中的德育课程教学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多

^① 黄书光:《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自我意识及其思考》,《当代教育论坛》,2005 年第 9 期。

元文化环境与当代德育创新等核心问题上。其中,之所以把德育课程与教学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考虑到二者的关系过于密切,若分别论述之,反而有人为割裂之感,且易造成背景知识的重复。因此,本部分内容拟安排上、下两章作重点探究。事实上,以问题为进路的教育史研究固然突出了问题意识,彰显了特定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的血肉关系,但它的缺点是容易造成研究对象的整体逻辑发展相对弱化。有鉴于此,本书不仅注意挖掘特定德育问题的价值蕴涵,而且十分关注其纵向逻辑嬗变;且第一章“中国中小学德育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制度变迁”,既可理解为一个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体现了对中国中小学德育改革发展的整体勾勒。概言之,本书虽然采用了以问题为主线的研究取向,但也在有意识地克服这一研究取向的固有弱点。

至于研究视角与方法,本人一贯坚持史料为先、史论结合,力求做到历史叙事与逻辑分析、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理论反思与实践考察的有机统一,并努力从文化哲学层面进行学理提升。全书正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中国中小学德育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制度变迁。本章从清末民初新旧德育观的博弈入手,探讨了民族危难中西方近代德育的本土化阐释、“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晚清学堂德育的制度化建构,以及民国初年德育革新与复古的双重变奏。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德育观念的激烈批判,考察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德育体系的可贵探索,并对风行一时的“学生自治制”作了个案剖析。其后,为了重新树立专制权威,南京国民政府热衷于文化统制和思想控制,企图以“党化教育”统领德育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十分严密的训育规范与制度。与之相反,人民共和国则确立了以人民为本位,以“五爱”为核心,以社会主义的苏联德育为学习榜样的新德育范式,并在建国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左”倾思潮泛起,中国德育的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至“文革”时更全面走向异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德育才开始摆脱长期以来的德育政治化遮蔽,逐渐实现德育观念的本体回归和德育实践的转型性变革。

第二章,从臣民到公民:德育目标的现代建构。本章依据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复杂变化,描绘了中国中小学德育目标如何从“臣民”走向“公民”的曲折演化轨迹。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异动和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传统德育模式及其所塑造的臣民人格遭致有识之士的强烈批判,并通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新教育”运动的连环激

荡,彻底暴露了传统德育的负面意义,从而使现代意义上的个性独立和健全人格得以浮出水面。然而,一定社会的教育,特别是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德育,总是一定社会政治的产物。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日子里,双方分别标举“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各自德育目标的精神向导。需要指出的是,被蒋介石篡改后的“三民主义”已非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而是排斥异己的专制主义;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以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为本位,其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无疑代表了中国现代德育的发展方向。新中国的中小学德育目标即是以老解放区德育为基础、以社会主义苏联德育为榜样而很快建立起来,但由于新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际遇和其后不断升级的“左”倾思潮,致使德育目标被不断拔高,德育的政治功能被无限夸大,战争时期的“革命”话语被盲目搬用,至“文革”达于极点且被严重扭曲。“文革”后,中国中小学德育目标才开始从“天上”回到“人间”,回到完全人格、健全公民的基点上,回到生活化、人本化和理性化的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第三章,价值观念变迁与德育课程教学的深层透视(上)。本章旨在求索清末民国时期价值观念变迁中的德育课程教学复杂面相和丰富内涵。作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价值原则,“中体西用”不仅确保了“西学”知识得以较大程度地融入现代学校系统的制度建构,而且“中学”伦理本位的坚持必然使清末学堂的德育课程设置、教科书编写与 actual 教学实践仍然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同时也自然折射出一定的西学因素。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专制帝国的覆灭和民主共和国的兴起,以及其后不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和新旧价值观念的根本转换;与之相应,中小学读经废除了,修身教科书与修身教学也都在不断改进,甚至于修身科也最终走向了坟墓。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共和国“公民”理想的身体投射。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三民主义”文化统制和“党化德育”的政策导向,显然加速了德育课程标准的建构,加强了德育课程实施的设计和监控,并进而在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推广所谓“新生活运动”。凡此种种,均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德育课程教学的规范化需求及其探索。但其真实的意图乃在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德育进行特定意义的政治化和军事化改造,以服从和服务于国民党的党国整体利益。

第四章,价值观念变迁与德育课程教学的深层透视(下)。本章先是论

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来的极具革命气魄的红色创造精神,突出了革命根据地中小学为革命战争及生产建设服务的课程设置原则,分析了简明、易懂、鲜活的革命教材,并考察了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联系实际、机动多样之教学策略。继而对“后革命时代”中国中小学德育课程教学的曲折发展进行深入探究,既考察了建国后17年“五爱”教育的实施、苏联德育思想的引入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高扬;又指出了当时阶级教育的突显与强化,以及政治化情结所带来的德育课程教学的频繁变动;更进而对“文革”时期的“斗、批、改”极左路线和狂热“革命化”的课程、教材与教学进行深入剖析;最后较系统地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德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德育课程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以及来自德育教学实践第一线的种种改革探索。

第五章,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环境与当代中国德育创新。本章针对席卷而来的全球化及多元文化挑战,探讨了当代中国中小学德育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路向。全球化作为当代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际遇,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最大限度地吸收其有利因素,包括世界各国的先进道德文化思想,尽可能地防范其不利影响;致力于传统德育的现代转化与传统人格的现代转型,努力培养具有现代素质、全球意识的“世界中国人”。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构成,数字化生存、网络化世界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全球伦理建构则是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必然要求,如何以全球伦理建构为契机,弘扬民族精神,创造性地整合东西方道德文化教育智慧,无疑是当代中国德育实现自我更新和主动参与世界的自觉选择。至于与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同生共长的德育政治化、功利化乃至工具化现象,我们不能不转变思维方式和更新价值观念,让长期累积的过于崇高化的德育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用儿童熟悉的前进的生活引导其向上发展;树立完整的生命意识,关爱儿童的内在需要与人格尊严,促使其身心健康成长;融入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积极养成主流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以期共同谋划以人为本、富强、民主的和谐社会。

第一章 中国中小学德育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制度变迁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小学德育已经走过了 20 世纪。百年来,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中国中小学德育形态必然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梳理中国中小学德育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制度变迁,探讨其不同时期德育发展变化的复杂性、独特性和规律性,对于我们更加理性地面对当代中小学德育问题显然不无裨益。

第一节 清末民初:新旧德育观的博弈与相持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中国中小学德育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时代”,新旧德育观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博弈,彼此观点迥异,争持甚烈,互不相让。此时,西方近代德育观念已被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陆续引入,进行着不同程度的“中西汇合”之本土化阐释。而“中体西用”指导下的德育观则由于满足了当时最高统治层的需要,自然成为清末学校德育变革的主角,甚至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回光返照,但终因落后于时代而被挤出历史舞台。

一、民族危难中旧学批判与西方近代德育观念的本土化阐释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民族双重危机的序幕。其后,不断升级的外国侵略战争日益将中华民族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强大的外力冲击和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国人最初的选择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和兴办洋务事业,企图在不变更传统“伦理”本体的基础上进行

前所未有的器物变革,主动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科技和自然科学。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苦心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却在甲午海战中大败于“撮尔小国”的日本,民族危难顿时弥漫全国。有鉴于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志士们在创巨痛深之际都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中国传统伦理教育观念的批判反思,由“器”入“道”,致力于西方近代德育思想的导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融通。虽然他们的学术个性并不相同,但其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深知包括德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在其维新变法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为了政治变法不得不培养变法人才,而为了培养变法人才又不得不对传统的专制主义教育及其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批判。在一度“大购西书”、“大讲西学”之后,康有为开始自觉以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为武器,来审视“穷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育纲领。在他看来,“理者,人之所立”,只存在“人理”,并不存在“天理”;相反,“欲者,天也”,人生而有食色之欲、喜怒哀乐之情,倒是十分正常的。因此,为学治教当顺其欲而导引之,不是“穷天理,灭人欲”,而是要自“天欲而人理”。^① 强调“天欲”的自然本性与“去苦求乐”的主体需求乃是后天教育的理论基础,称:“治教以去苦求乐”,“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也,其道善;其于生人乐无所加而苦尤甚者,是退化也,其道不善”。^② 很显然,这是以西方近代自然人性论去抗击和否定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道德本性论,其目的在于人的解放和西方人本主义德育理念的引入。

为了让国人能够尽快地接受西方近代德育思想,康有为十分注重通过托古、比附的方法进行理论阐述。虽然这种阐述并不科学,但其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如:博爱,这一广泛流传的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康有为直接将其等同于孔子的“仁”,称“博爱之谓仁”^③。反之,不仁则必背人道而残害天下。他说:“老子以不仁为道,故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韩非传之,故以刑名法术督责钳制,而中国二千年受其酷毒。”^④又如:自由,康有为把它与子贡所言进行比附,说:“子贡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

① 《康子内外篇·理气篇》,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② 康有为著:《大同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358页。

③ 《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

④ 《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页。

犯人之自立自由也。”^①在这里,他突出了自由的权界,既注意到与儒家的思想沟通,又把握住西方自由精神的深刻内涵。再如:平等,康有为干脆把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几何公理”——“平等”精神归功于孔子,直呼“孔子创平等之义”^②,企图把孔子改造成专制主义制度的改革先锋,以期为自己的维新变法张目,而全然不顾孔子是等级制度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的基本事实。诚然,康有为的托古比附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弊,但其反封建的启蒙思想显然“已壁立其中了”^③。

与康有为齐名的另一个维新派重要人物梁启超,他不仅全程参与了维新政治变法,而且在变法失败后仍然醉心于西方近代伦理教育思想的引入与传播,有些见解甚至比乃师更进一步。以“自由”为例,康有为习惯于把它论证成儒家思想所固有,且担心自由过度而酿成惨祸,故时有改制托古、尊孔保教之论。对此,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渐起疑窦,并因此在思想上与乃师决断。他说:“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依傍混淆而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蒙盖于此三致意焉。”^④在他看来,不受“三纲之压制”,“不受古人之束缚”,还人以堂堂正正的“为人之资格”,才是真自由。他说:“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曰‘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⑤除自由外,梁启超对平等、独立、竞争、利己等西方近代伦理观念也都一一予以讴歌、阐发,并注意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且与之调和汇合。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其理想中的“新民”人格。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⑥无论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还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都堪称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他所极力阐发的“国家意识”、“公

① 《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页。

② 《大同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③ 黄书光著:《中国教育哲学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④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3页。

⑤ 《致康有为书》,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138页。

⑥ 《新民说》,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德”、“独立”、“竞争”、“进取”、“冒险”等新人格素质,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而且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德育观念的推陈出新。

作为维新阵营中的激进人士,谭嗣同有着侠客般的鲜明个性。他不满于洋务派所谓“道”不可变的“中体西用”说,以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徉,若一幻物……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①在他看来,如果变法不能触及“三纲五常”,便是没有击中要害。为此,他决心要冲决包括“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在内的一切束缚人的封建教条,大胆宣称:“二千年来之政治,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②强调“大盗”与“乡愿”互相勾结,致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饿死虽小,失节事大”的说教,更使谭嗣同感到极大愤慨,禁不住为中国妇女发出“何不幸而为妇人”的哀怨,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强烈抨击。与此同时,谭嗣同通过创造性的中西伦理会通形式,大力引进西方近代伦理精粹。他认为,原始儒家的核心观念“仁”是“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③在他看来,层层笼罩的“上以制其下”之封建网罗致使人与人之间否塞不通,其“惨祸烈毒”令人不寒而慄。职是之故,他力图重建“仁”学精神,希望通过“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的理想社会构建,去召唤其心目中的平等、自由、博爱等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精神。

维新派中对西学了解最深切者当推严复,多年留学英国的学术背景和长期钻研西方学术名著使他锻造出一双“火眼金睛”,颇能敏锐地指出旧学的弊病,并对症下药地引进西方近代最新学术思想和德育新知。依据“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天演法则,严复深知“法已大弊”的中国若不思变革必不能久立;贸然引进西方富强之政而无视其人的素质之培育,同样是劳而无功。他说:“苟民力已,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④在他看来,国民素质之所以薄弱,不仅与封建专制主义愚民政策有关,而且是长期以来礼教牢笼与科举制度的直接结果。以“男女大防”为例,严复称,中

① 《报贝元徵》,见《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7页。

② 《仁学》,见《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③ 《仁学》,见《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页。

④ 《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页。